



中国近代社会
思潮研究丛书

救世与救心

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

李向平 著

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
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
之一切苦，将笑为狂语而不复
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
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利
禄之网罗，留作券剂耶？

——题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92342

B949.2
24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救世与救心

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

李向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任 意

•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

救世与救心

——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

李向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25 插页 5 字 227,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1615—1/B·197

定价 12.00 元

D434 B4

丛书总序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一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和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发生了甚至春秋战国时代也难以相比的激烈动荡和深刻变迁。这是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折时期。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中心问题，中国的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形成了思潮峰起、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略举荦荦大端，其中即有进化论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科学救国思潮、平民教育思潮等等。在短短百年间，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数十年间，如此多的思潮纷呈涌动，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可以说是没有前例的，它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思想的空前活跃，争鸣的空前激烈，精神的迅速高扬。就具体的思潮而言，它们可能是有得有失，有积极面有消极面，有的甚至可能是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但是，思潮峰起的总画面表现了民族精神在寻找救国救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在这一长期艰苦的探索中间，形成了值得珍视的近代文化传统。

说及传统，人们通常容易只理解为古代传统。诚然，中国古代有悠久的文化传统，需要我们去批判地继承，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服务。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决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文化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生活中依然有生

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冲撞、汇合的时代，西风东渐，文化的渗入，思潮的传输，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形成了既不同于古代中国又不同于近代西方的特点。即以我们前述诸社会思潮而言，它们中大部分经过了西方的媒介，但几乎无一例外都与它们在发源地时有相当的不同。中华民族历来是富于创造性的民族，近代严峻的历史条件的挑战，更激发了她的创造性。所有这一切，即古代文化传统在近代的转变，西方文化的传入及其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近代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就构成了中国近代的文化传统。这是对当代中国人更有影响力的文化因素。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当代文化讨论中的许多问题，大多是在近代史上已经反复争论过的问题；某些当代人的思想观念、精神倾向完全可以在前几十年中找到模本，就不难理解近代文化的这种持续性、连贯性。其中，既有许多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深入寻访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

因此，加强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把握近代文化传统，进而把握历史的流向，无论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学术研究，还是作为历史的反思，给现实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我国学术研究中还几近空白。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这套“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是很令人高兴的。

本丛书的宗旨，是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为对象，通过描述这些社会思潮的兴衰、演变、交错迭代的轨迹，提供一种研究近现代社会历史的新视角。丛书的每一部著作都对某一社会思潮中的人物、流派、思想作动态的研究，并对其社会根源、影响及教训作多侧面的理论探

索；全套丛书汇总，希望能够帮助人们达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某种总体性理解。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它们所研究的，可以主要是哲学思想、或者政治思潮、或者文化、宗教思潮，即每一部著作的侧重面可能颇不相同，但作为丛书整体，强调的是社会思潮。换句话说，不管这些思潮的侧重面在哪里，它们都是对整个社会发生广泛影响的思潮，而不是只在狭窄的专业圈之内发生影响的理论。所以，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与一般的近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将有很大的不同，它常常需要跨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从而反映出社会思潮自身的广度与深度。在方法上，本丛书注重研究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思想如何传入并影响中国，而中国古代传统又如何被发掘、继承及转化，从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富于民族特点。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传播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为了要把握它们的近代民族特点，又需要通过中西比较的途径。我们希望借助这种研究跨度和研究方法，提高社会思潮研究的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多种学科的专业工作者的注意，同时也可以帮助一般读者对中国国情与近代传统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本丛书的作者，多为从事中国近代哲学、思想、文化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思想敏锐、神旺笔健，学养也日臻丰厚。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多系他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现在奉献给读书界。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教，并因此有助于推进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冯 契

一九九一年七月

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利禄之网罗，留作券剂耶？

——谭嗣同

佛力无尽，我愿亦无尽。

——梁启超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冯 契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鉴平 刘志琴 何兆武

张利民 胡伟希* 高志仁*

高瑞泉*

[有*号者为编委会常务联系人]

目 录

绪论：异端可谓正统的晚清中国	1
一、存在与意义的双重迷失	2
二、寻觅救世新精神	8
三、知识分子的选择	13
四、佛教复兴的先师：杨文会居士	22
第一章 慈悲救世与变法维新	30
第一节 康有为：时代苦难的先知者	31
一、圣贤与菩萨的双重使命	31
二、“入世界观众苦”的慈悲主义	37
三、极乐世界与现实世界	44
第二节 谭嗣同：鲜血印证的信仰	49
一、独高于群教之上的佛学	51
二、以心挽劫的宏大悲愿	58
三、“仁”、“识”一体：近代哲学的雏形	65
第二章 信心与道德的重建	77
第一节 梁启超：以佛教改造国民性	78
一、佛教有益于群治	78
二、以三界惟心之理，除心中之奴隶	85
三、我注佛经式的哲学思考	92
第二节 章太炎：依违在“真界”与“俗界”之间	101

2 目 录

一、转俗成真的“唯识教”	103
二、冥探真极的哲学构架	113
三、回真向俗为儒宗	131
第三章 人间佛教，世学为用	145
第一节 欧阳竟无：创立支那内学院	146
一、佛教非宗教非哲学	147
二、批判《大乘起信论》	155
三、自证超越的理性精神	160
第二节 太虚和尚：近代佛教的马丁·路德	169
一、佛化世间的自觉心	170
二、倡导佛教革新运动	178
三、综摄社会思潮的新佛学	186
第四章 异端的情怀	204
第一节 有无生灭之际	205
一、龚自珍：颓波难挽挽颓心	206
二、苏曼殊：亦僧亦俗，红尘菩提	214
三、李叔同：头陀苦行，晚晴老人	225
第二节 信仰的艺术	236
一、丰子恺：艺术与宗教间的彷徨	238
二、许地山：佛教哲理的文学思索	249
第五章 扬弃佛教思潮	263
第一节 梁漱溟：走出佛门的儒家圣人	265
一、倾心于“第三路人生”	265
二、唯识宗的信仰	273
三、由菩萨到圣人	284
第二节 熊十力：于流行而识得主宰	293
一、以空遮有，破相显性	294
二、“观空”以“思诚”	306
三、“恒转”即为本体	315

四、亦佛亦儒的近代哲学体系·····	326
第六章 结论：真实的随遇 ·····	339
第一节 出世与入世的调和·····	341
一、意在世间的居士佛学·····	342
二、走向唯识学的知识兴趣·····	348
第二节 中国当以有信仰而获进·····	357
一、并非究竟的终极关怀·····	358
二、潮去奔雷又寂然·····	365
后 记 ·····	374

绪论：异端可谓正统的晚清中国

清朝雍正皇帝曾有两部生平最为得意的著作。一部是《拣魔辨异录》，专与一位和尚辩论；一部是《大义觉迷录》，专和吕留良的门生曾静辩论。从前一部书来说，事情起因于天童圆悟禅师的弟子法藏，其著《五宗原》，标立己说；法藏弟子名弘忍，复作《五宗教》，以回护师论。雍正皇帝于是专著此书，逐条驳正，以为“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接着以行政权力将法藏、弘忍的著作语录尽行毁板，不许僧徒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以不敬神论。尽管雍正皇帝亦喜研禅理，提倡净土，但如此讨论禅学，是以“人王而兼教主”，天下之人谁敢不服！信仰自由来自何处！

历史上中国的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素有紧张对峙之因。雍正皇帝之所为，也是佛、政关系紧张的一个侧面。佛教之所能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是在接受并襄助王权教化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相对于本土儒教而言，佛教无疑是被视为“异端”，故尔一部中国佛教史，常有“沙门不敬王者”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紧张与对峙。尽管两者之间多已折衷调和，但是佛教的出世主义与诸行无常的世界观，往往亦可表现为对现有政治社会的否定或批判态度。在所谓的政清人和、王权兴盛的承平年代，此类文化特征很难表现也不可能向外显露；而在政治衰败、国势萎靡之

际,佛教便可乘虚而入,显起身手。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绝无此类现象,以宗教神学的剧变或改革来激发或推动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层面上的变易。恰好相反,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才是中国宗教得以自在发展的黄金时光;被视为异端之佛教因此才有可能形成某一社会层面上的“正统”。当然,这也是一种暗示:随着这种动荡局面的收拾,佛教有可能又恢复其“异端”的传统身份。

晚清中国,恰如一个拆散中的时代。做皇帝的此时已无势力亦无闲心来展现他以“人王而兼教主”的威风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因此,佛教(也和其他各种学说类似)获得可以一振雄风的良机,从其狭迫的“异端”一隅,跃向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

一、存在与意义的双重迷失

晚清中国之政治腐败无能,导致国势每况愈下的这段历史,已为世人所熟知。然而,大清王朝的王权衰落,无力统治它固有的国土疆域,无法抵御伴随着鸦片与大炮涌入中土的西方列强势力,不仅仅是使中国人感到了在社会存在这一层面上的朝不保夕危机感,时时产生亡国绝种之忧虑,而且也颇使中国人由此而一度丧失道德意义与生命价值。

依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模式,其王朝政治多与神学宗教合一。王朝政治出于“神道设教”的意图,必然把各种宗教教义纳入它自己的轨道之中,使其承负礼义之教、教化之教的责任和义务。天子王权则不须“神授”,仅要按照天子的旨意来对其王权的至上性、专制性进行“神化”即可。任何宗教都不可能凌驾于皇帝的头上,以天下主宰的意气来君临天下。所以中国政治与中国宗教形成了一种服从于王权天子的政教合一的特殊关系,

宗教的信仰大都转化为国家观念及政治信仰。

为此，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地位至上的“天子”就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最高政治权威，而且也是“天下”宇宙间自然秩序的维系人。无论是人类社会秩序，还是神圣的宇宙自然秩序，都必须依仗于“天子”，才有可能获取最具有道德生命意义的解释或保持。从专制王权的无所不统、无所不在而言，一朝天子自然就是社会中物界文化与灵界文化的最高中心，所以是一日无君遑遑如也，文化价值意义秩序因此都土崩瓦解了。况且，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王权往往被儒教道德化伦理化，从而神圣化。先是内圣者外王，继而是外王者内圣，最终是王圣合一。这种类型的王权因此又成为芸芸众生心目中神圣与道德的象征，政治与信仰为此而多有合一的迹象。

所以，晚清政府的无能昏庸，天朝王权在西方列强势力的威逼之下，甚至连龟缩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安稳都丧失殆尽，这一无情的历史客观，给许多中国人以震惊、痛恨的，自然就不会局限在社会政治秩序方面了，它同时还具有或潜藏着更深层、意义期深远的价值秩序方面的危机。以往的人生世界、价值意义，都在“政教合一”、“内圣外王”式的意义系统里安排得井然有序，一旦这个系统被冲击、被击碎，那么，人生世界与价值意义将能安放在何处呢？从这一层面而言，晚清政治秩序的混乱与清政府政治统治的无能，亦即是文化价值意义上的一个“转效点”。

正如古代知识分子必须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把道德修养与文治武功相提那样，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把救世与救心并论，不仅是要去拯救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危机，而且还要去拯救近代中国人在生命价值意义方面的危机，必须是救国救亡与意义世界的重建双管齐下。

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乃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正宗。举凡人伦日

用之纲常伦理与王权政治的合法性，都由它来予以证明和构造。它提倡君臣父子夫妇作为人间伦理的核心，它主张祭祖、祭天，将宗教性祈求体现在王朝政治秩序之中，它奉行“天地君亲师”的宇宙秩序，将对社会组织、天地万物、时间空间的一切权力归之于一朝天子。在此情形中，任何其他宗教都不会有可能作为一类独立的精神力量而存在。而且，即使儒学正统本身也不得不成为王朝政治秩序的依附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时至近代，它也必然随着清王朝政治的腐败而失落了它精神正统的地位与作用。

其实，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对中国各地的不断侵入与渗透，首先冲击近代中国人精神价值世界的，倒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跟随着枪炮、商品之后大量涌起中土的基督教。这是在儒家正统地位已经大有失落、清朝政府无力自强之际，中国人面临着真正而又深刻的信仰危机。当时就有人指出：“通商图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①“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夺华人之心”^②。已经看到了基督教作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系统涌入中国，从而打破了中国人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固有的意义秩序。其严重和危机的程度，可说是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之后所未有。

基督教来华之后，最可引发中国人感到精神迷失的，就是它提倡上帝崇拜，无父无君，以不祀鬼神不祀祖先为首务。在中国人看来，此乃为“悖理败伦”、“斩吾根本”、“即率中国之民，启中国之变”，以上帝来“示其归心”……。“《论语》曰：‘慎终追远，

① 沈保桢：“总理船政前江西巡抚沈保桢奏附条说”；《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

② 李东源：“说传教”；见《洋务提要》。

民德归厚’。自天子以至于庶民，莫不有祖宗。今天主教曰，人死无知，不必立主，祖宗不必祭祀，灭子孙爱敬之心，败国家孝治之化，此其灭绝祖宗不如豺獭。”^①正是凡有识者，皆所深恶痛绝。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曾指责太平军崇拜天主教，人人皆以兄弟姐妹称呼，大毁儒家之君臣父子伦理，以此来号召地主阶级共同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其有《讨粤匪檄》一文云：“……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苦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②其中，至少是说明了上帝观念的侵入，对于孔孟儒家正统、千年之名教，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针对此类现象，李鸿章也曾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咸丰十年，天津用兵，举戈犯关，逆焰鸱张，可谓极矣。然竟不敢据有城邑者，诚畏中国人民之众也。故但要为盟约，以通商广取中国之财利。即以传教阴结之心。夫国家治安天下，以固心为本，岂容他国人阴为邀结。今既准其传教，愚民无知，易受笼络，一入其教，则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国法矣，此其动摇国本也。”^③不论对西方列强持何种态度，但对基督教天主教的精神侵略，无不看到了其俘虏人心、动摇国本的严重后果。同时，这也反映了在固有的中国文化系统中，已确无在价值观与世界观上可以与之充分抗衡的精神武器了。

此外，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失败后，各种世俗民间性的迷信活动及其思想观念也得到了相当的蔓延，诸如算命、相面、抽

① 王炳燮上倭仁书；引自《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32页。

②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文集》，“文集”，卷三，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2681页。

③ 李鸿章序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

筮算卦、风水堪舆、跪拜天地、敬神信鬼、巫婆神汉、设坛扶乩等等，不仅流行于农村，也风行于城市，甚而波及于知识界。各种迷信组织及其刊物相续出笼，宣扬神仙鬼怪妖精的文章也公诸报刊。同时，它们与传入中国的西方“灵学”结合起来，借着“科学”的幌子，鼓吹灵魂不灭、有神论等思想。各种与此有关的“灵学”组织因此而成立起来，并出版刊物与书籍。如其《灵学要志》公然标明该刊为“神圣仙佛乩笔劝世兴教救劫之书”；“悟善社者，神之托于人以劝天下之善，而为民清命者也”。并主张“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奉神仙为人之至善至圣而可救世之灾难者。^①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道德价值、生命意义迷失的表现。当社会动荡或社会变迁导致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崩溃时，人们会去寻找新的价值依托或文化共同体，而这种寻找过程又不得受制于寻找主体的生活条件与社会地位，他们因此而只会寻找那些与其固有的社会地位及价值观念较相适宜的精神寄托。所以，世俗民间的种种迷信活动及其思想的活跃，也都表明了下层百姓同样感受到了他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传统价值规范已无能为力，他们只能自寻精神出路，在民间宗教里获得一种价值象征性的安慰或补偿，故其迷信活动亦有些时代色彩，如“兴教救劫”、“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等等，其意义的追求考虑到社会存在方面的困境与痛苦。

其次，西学东渐，各种西方之文化思想观念及价值观、世界观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在此冲击之下，一时间颇显手足无措。许多价值观念仿佛已失却了往日的社会效用，传统儒家的天命论、圣人说及修齐治平等政治道德模式，

① 参见肖万源：《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和鬼神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